

跨文化视野中的中亚东干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战争文学

司俊琴¹ 常文昌²

(1.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中亚东干文学一方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另一方面, 由于处在前苏联多民族文学的文化语境中, 它也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化的历时传统与共时语境影响下, 东干与俄罗斯战争文学在英雄主义主题、人道主义的叙事视角及悲剧的审美意蕴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同时, 东干战争文学又受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与中国回族独特的民族心理的影响, 凸显出一些独特的民族精神个性。

关键词: 东干文学; 俄罗斯文学; 战争文学; 跨文化; 华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 I36.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0)03-0058-07

中亚东干族是清末中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 现有十余万人, 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一百多年来, 东干族人民既坚守着以伊斯兰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之根, 抵御着异族文化的同化, 同时又积极吸纳居住国文化的精华,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干民族文化。作为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1], 东干文学是东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东干文学包括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两部分。如果说东干民间口传文学是中国文化在中亚土地上的传承的话, 那么东干书面文学则受居住国文化的影响较大, 特别是居住国主流文化——俄罗斯文化是东干书面文学形成的主要动因。正如吉尔吉斯著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所说: “每一种当代的苏联文学, 都有两个起源: 一个是本民族的传统, 一个是俄罗斯文化的传统。”^[2]俄罗斯文化对东干书面文学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文艺政策、文化思潮、文化精神及文学作品的题材与美学风格等方面。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 革命文学具有很高的地位。如果说西欧文学曾经给世界文坛奉献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 那么20世纪俄罗斯文学则将革命奉献给了世界^[3]。而与革命主题密不可分的则是战争题材的书写。战争题材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题材, 二战后, 战争题材在东干文学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东干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战争文学两者

的关系, 笔者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梳理出其所凸显的三个最主要的共同特征, 即: 英雄主义主题、人道主义的叙事视角和悲剧的审美意蕴, 并在跨文化视野中, 从民族心理、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层面分析了形成这些文学特征的原因, 以期管窥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及文化间的关系。

一、英雄主义主题

二战中牺牲最惨重的是俄罗斯民族, 俄罗斯人民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共牺牲了2700万以上的宝贵生命, 占二战中全部牺牲人数的40%^[4]。在战争中, 俄罗斯作家同样经受了心理素质与创作才能的巨大挑战。有1000多位作家上了前线, 471位作家牺牲在了战场上^[5]。这场劫难给俄罗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 也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东干族在卫国战争期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时不足三万人的小民族, 牺牲在前线的青年就将近两千人^[6]。战争期间, 活跃在文坛上的东干作家大多走上抗战前线。如雅斯尔·十娃子、阿尔里·阿尔布都、亚库甫·哈瓦佐夫、尔沙·白掌柜的, 等等。其中阿尔里·阿尔布都在列宁格勒900天围困中为保卫“生命线”三次负伤, 战后荣获两枚军功章^[7]。雅斯尔·十娃子在战争中作为战地记者, 曾获得过六枚军功章和十枚国家级奖章^[8]。他创作了大量鼓舞

收稿日期: 2009-10-11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基金项目(LZUGH08014)

作者简介: 司俊琴(1972—), 女, 甘肃会宁人,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士气的抒情诗歌,可惜许多作品没有发表。发表的诗作中的战争英雄特写《天山勇士》《英雄的无常》等,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争初期的俄罗斯小说以中、短篇为主,洋溢着激昂的英雄主义情绪。中篇小说如别克的《沃罗克拉姆斯科大道》、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不朽的人民》、戈尔巴托夫的《不屈不挠的人们》等,或表现前线士兵的英勇奋战,或表现后方人民的抗敌精神和意志。在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俄罗斯性格》(阿·托尔斯泰)里,作家更是把俄罗斯人民保卫祖国的献身精神与崇高的道德情操,上升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诗歌创作非常繁荣,数量超过了小说,除了大量政治鼓动诗外,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抒情诗与叙事诗。抒情诗如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伊萨科夫斯基的《灯光》、苏尔科夫的《窑洞》等,以爱情来表达战士对故土的依恋、对胜利的信心。叙事诗如女诗人阿丽格尔的《卓娅》、安托科利斯基的《儿子》、英贝尔的《普利科沃子午线》等,展现了在严酷战争环境中俄罗斯人坚强不屈、英勇抗敌的崇高精神。叙事诗中尤其以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成就最高。诗歌中塑造了一个英勇机智、淳朴善良、历经苦难与死亡的威胁,仍然不屈不挠的英雄战士形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品质,因此被誉为卫国战争年代的“奥德赛”。

同俄罗斯战争文学一样,这一时期的东干战争文学也体现出昂扬乐观的英雄主义气概与伟大的献身精神。小说方面,东干族著名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的短篇小说《英雄的战士》以二战英雄、东干人民的优秀儿子王阿甸诺夫的真实事迹为基础,正面描写他在战场上勇敢、机智、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穿插了英雄王阿甸诺夫在战斗间隙给战友们传授种水稻的技术,讲述家乡的风土人情等情节,并通过他读家信、写家信等细腻的心理活动把英雄描写得有血有肉。中篇小说《头一个农艺师》中用大量篇幅叙写二战爆发后,东干族青年踊跃参战,后方妇女辛勤劳动、支援前线的感人场面,充满爱国激情与战争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其中,主人公聪花儿给乡亲们讲述俄罗斯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感人事迹,激励他们在后方努力劳动。从这个片段可以进一步印证俄罗斯战争文学与东干战争文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一位东干族作家亚库甫·哈瓦佐夫的短篇小说《天职》讲述战争开始

后,胜利农庄的水管员拜克尔和农庄的青年一起要求奔赴前线。他走后,他的妻子毅然担负起丈夫的工作。在她的带动下,许多年轻女子也都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干的活儿。拜克尔与妻子及无数东干人以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爱国精神与无私的奉献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小说表达了保家卫国是每个人的天职的思想主题。

诗歌方面,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吉尔吉斯“人民诗人”雅斯尔·十娃子写了许多反映战争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英雄的赞扬、对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诗人在《英雄的无常》中写道^①:

朝着西方去的呢
我的英雄,
就像往前溜的呢,
就像活人。
就像海禽飞的呢,
手伸得长,
把一块地抱得牢,
不叫谁撞。^{[9]74}

诗人在另一首诗《得胜》中写道:

得胜把门敲的呢,
就像主人,
赶快它就进来呢,
就像山风。
连它一同进来呢,
高兴、鸿运,
就像太阳出来呢,
挤散黑云。
那会石头开花呢,
五更翅唱,
母亲有子,子有父,
妻人有文。^{[9]75}

此外,他的诗歌《给法西斯》《人没了,心在呢》《英雄》《要叫占我的位儿》《革命的兵》等,都体现出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主题。

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之所以成为东干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战争文学的共同主题,除了受战争环境的影响之外,还与这两个民族各自的爱国主义传统与尚武精神有关。

俄罗斯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源于俄罗斯民族“第三罗马”的辉煌历史,以及俄罗斯人是上帝选民的宗教理念,这些都使他们获得了极强的民族自

^①本文所引雅斯尔·十娃子的东干文诗歌均为常文昌和司俊琴所译。

尊和自信。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总是以“神圣罗斯”的名义号召人民,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同时,俄罗斯民族还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千年历史就是其争取独立与自由而不断战斗的历史。12世纪之前与黑海之滨的游牧民族的战争、13—15世纪为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17世纪与瑞典与波兰之间的战争、19世纪与拿破仑军队的战争……体现在文学作品里,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战争文学作品,如最早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壮士歌》是描写战争的;稍后的战争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发源处一座宏大的纪念碑;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关于战争的书写,如《顿河彼岸之战》等;18世纪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描写战争的作品也很多,而19世纪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战争主题的先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全方位展现了战争的宏大场面^[10]。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形成了一个关注战争、书写战争的文学传统。

与俄罗斯民族一样,东干民族也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和尚武精神。东干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主张为正道而战,为信仰而战,体现了一种爱国主义思想。如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认为,“真主确是我的主,也确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他。这是正路。”^{[11]3:51}并且指出:“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11]22:39}。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教还把信仰与爱国、忠君等思想糅合在了一起,如明末清初回族学者王岱舆提出“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12]这些思想对东干族人民也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他们信奉真主、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传统。

另外,阿拉伯民族能征善战的基因与中国回族爱武习武的传统也铸就了东干族不屈不挠、勇于反抗的民族精神。当年东干人在首领白彦虎带领下奋起反抗清朝统治者与民族歧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翻越天山,在异国他乡寻到了一条生路。二战期间,出现了马三青、曼苏子·王阿訇诺夫等战争英雄。国内战争时期,马三青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深得伏龙芝器重,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为了纪念他,东干人把他的出生地营盘后来改名为马三青。卫国战争时期,出生在东干乡庄的英雄曼苏子·王阿訇诺夫在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激战中,战友们全部阵亡,他独自坚守着阵地。敌军向他扑来时,他拉响迫击炮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都是东

干民族精神的代表。

二、人道主义的叙事视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家对战争的不断反思,俄罗斯战争文学从以表现战争场面为主,转向了以战争为背景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考人的生存价值,从而把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主题与人道主义思想结合了起来,道德探索成了战争文学的主要叙事视角。

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等中篇小说中,以人道主义的叙事视角对战争进行反思,强调人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道德因素与精神力量。诗歌方面,叶甫图申科的《妈妈与中子弹》《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沃兹涅先斯基的《戈雅》等叙事诗,对战争及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进行反思,歌颂人道主义精神。

相应地,战争后期到60年代末的东干书面文学作品中,“对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创伤,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切感受与理解,都在作品中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揭示。”^[13]东干战争文学在表现被战争毁灭了的生命怜悯,在非人性的战争中描绘人性等方面,与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战争文学是一致的。

雅斯尔·十娃子有许多诗,都以人道主义的视角叙写战争给作战双方造成的伤害。如《仗就是他》写战场上两个士兵互相射击,结果一个被击中,立即死去,麦地里添了一个新坟。但是:

家里媳妇等着呢,
连花一样,
成下年轻寡妇哩,
她太孽障。
单怕小孩哭的呢
——阿妈,你说,
多会我大回来呢,
他可抱我?

而对于活着的士兵来说:

明儿你也折掉呢,
连他一样,
可续一个新坟呢
打世界上。
你的媳妇也哭呢,
眼泪不干
……^{[9]64-65}

又如他在《俄罗斯不要仗》里写道:

真个俄罗斯不要仗
你也要问。
……
这可不是她没劲，
不会打仗
……
光是她不想倒血，
不爱打仗。
也不想叫小孩哭，
眼泪像江。
再不想叫老娘等
儿子，姑娘……
也不想叫搁鲜花
新坟头上。^{[9]221-222}

此外,《我也是兵》《又高兴,又泼烦》等诗篇都表现出作家的人性思维及人道主义的博爱胸襟。

战争遗孤问题是俄罗斯作家和东干作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两者共同的书写内容,并且,从这类题材的描写中也能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明显影响。如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中,主人公失去所有亲人后收养了一个孤儿,并把抚养孤儿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而东干女作家阿依莎·曼苏洛娃的短篇小说《你不是耶提穆(孤儿)》的主人公穆萨,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收养了战友留下的一个三岁的孤儿,为了避免给孩子心灵上留下太多的创伤,他不愿意让更多的人了解孩子的身世,因而招来了乡庄里人们的闲言,等了他四年的未婚妻也跟他绝交了。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的阿舍尔娘帮他精心地照料着耶提穆,在阿舍尔娘的疏通下,穆萨的未婚妻最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和穆萨重归于好,把烈士遗孤认作自己的儿子。《一个人的命运》和《你不是耶提穆》两篇小说,都有着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

俄罗斯战争文学和东干战争文学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妇女与儿童的视角来审视战争的。妇女和儿童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从他们的视角更能揭示战争的不义性质、展现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俄罗斯小说中,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和《最后一批见证人》,分别以妇女与儿童的叙事角度来展示战争。东干小说中,尤苏尔·老马的短篇小说《往事》以一个东干人的母亲——乌克兰籍老妇人的视角来透视战争: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乌克兰妇女带着一对儿女转移到吉尔吉斯斯坦一个偏僻的东干乡庄。乡庄东干妇女赛麦娘热情关照他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给他们送米、送菜,准备柴禾。偏僻山村的医疗条件差,男孩病了,赛麦娘带来中草

药,给孩子治好了病。乌克兰妇女病逝后,赛麦娘让两个孩子搬到她家去住。后来,赛麦娘的外甥——东干族小伙子从前线负伤回来,他与乌克兰姑娘相爱了。养好伤后小伙子又上了前线,并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但是东干人这份珍贵的情感留住了乌克兰姑娘,40年来她从未想过要离开这块给了她无比厚爱的土地,独自抚养大了她与东干人爱的结晶——他们的儿子。作品从一个妇女的视角展示了东干民族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俄罗斯文化中,人道主义有绵长的渊源,它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深受东正教宗教文化的影响,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就是爱:爱上帝,也爱他人,其中就体现着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指出:“人性是俄罗斯思想之最高显现……人高于所有制原则,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14]俄罗斯古典作家把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灵魂,这种观念在历代俄罗斯文学大师身上一直延续下来:从18世纪的康杰米尔、杰尔查文、拉吉舍夫,19世纪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高尔基提出了“文学就是人学”的命题,充分表述了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观点。苏联时期,在“解冻”思潮影响下,随着对“个人崇拜”批判的深入,文学界对人道主义的呼唤越来越强烈,人道主义重新成为俄罗斯苏联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1956年俄罗斯美学家阿·布罗夫鲜明地提出艺术应该以描写人及其生活为主要任务,并明确指出:“艺术没有人道主义,没有对人的爱是不可想象的。人道主义,是崇高艺术的活命之水,是艺术存在的条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人道主义是他的性格中真正的职业特点。”^[15]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与文学思潮自然也是东干作家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与依据。

从东干文学自身来看,东干民族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古兰经》中反复强调要“劝善戒恶”、“争先行善”、“善待他人”、“怜恤孤儿”等,既重天道又重人道,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如《古兰经》中明确提出:“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11]21:107}“你们当崇拜真主……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

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1]4:36}其中“怜恤孤儿”是穆斯林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兰经》中明确规定:“他们问你怎样待遇孤儿,你说:‘为他们改善他们的事务是更好的。如果你们与他们合伙,那么,他们是你们的教胞。’”^{[1]2:220}这种人道主义的宗教文化意识融化在了东干族人民的血脉中,潜藏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并且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据王国杰考证,二战期间中亚地区作为大后方,大批的伤残人员与孤儿转移到了这里。特别是1942年,莫斯科一个有400名孤儿的孤儿院搬迁到了中亚东干乡庄,13名东干妇女因收养孤儿荣获劳动红旗勋章与奖金^[6]。自然,人道主义也就成了东干战争文学的一个主要书写内容。

同时,东干文化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重视道德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孔子说过:“君子怀德”(《论语·里仁》),“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中国儒家文化推崇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爱,其基础是“爱人”,“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

三、悲剧的审美意蕴

战争结束后,作家对战争的理解不断加深,认为过去的战争文学只写重大的军事活动与感人的英雄事迹,没有揭示出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及战争与人的命运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作家开始把英雄主义与战争的悲剧性结合起来,揭示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探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

俄罗斯小说方面,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早揭示战争创伤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的苦难:战前他有温暖的、有温柔、体贴的妻子,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战争爆发后,他在战场上受伤被俘,从战俘营里死里逃生后,才知道后方的妻子、女儿在敌机的轰炸中全部遇难,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在战争结束的前夜牺牲于异国他乡。战争结束后,他忍着悲痛,把全部感情倾注在一个孤儿身上。在肖洛霍夫的影响下,一大批亲历战争的作家以自己在战场上的见闻与感受为依据,描写战场上血肉相搏的惨状和普通士兵的内心感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战壕真实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邦达列夫的《营队请求火力支援》《最后的炮轰》、贝科夫的《鹤唳》《第三颗信号弹》等中篇小说。

俄罗斯诗歌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诗《路旁人家》、伊萨科夫斯基的抒情诗《敌人烧毁了老家

的小屋》、阿赫玛托娃《盛开的野蔷薇》诗集中的一些诗篇更早地触及战争创伤问题。尤其是维诺库罗夫的名作《勿忘我花》用鲜花、爱情等意象烘托阵亡战士形象,以强烈的对比渲染战争的悲剧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受俄罗斯战争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东干战争文学也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短篇小说里有尔里娃·田古拜的《命运》、亚甫甫·马米耶佐夫的《思念》、尔沙·白掌柜的《盼望》,中篇小说则有阿尔里·阿尔布都的《一条心》,纪实性小说有阿依莎·曼苏洛娃为纪念二战中牺牲的父亲而写的《眼泪淹心呢》《浚烦记想》《谁能忘掉?》,等等,均描写的是战争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创伤。

《命运》写两个青年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作品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战前两个刚走出校门的青年玛玛儿与文迪儿对生活的憧憬、对爱情的朦胧的渴望。卫国战争爆发后,玛玛儿在战场上凭借自己的机智与好运,没有负一次伤,迎来了战争的胜利。而文迪儿却牺牲在了前线。他的母亲听到噩耗后,不到一个月也去世了。玛玛儿思考着命运的含义:战争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精神憩园,人们饱受苦难,甚至失去生命,这是命运吗?《思念》以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来展示主人公的美好人性,谴责战争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摧残:18岁的东干少女存姐儿在苇湖边遇到了本村青年沙里尔,他们在劳作中产生了爱情。经历了漫长的思念与焦灼的等待后,终于有情人成了眷属。但是婚后才三天丈夫就上了前线,从此她再也没见过丈夫的面,也没顾上和他照一张相,有时甚至连他的相貌都记不起来了。思念丈夫的时候她只要看一眼长相酷似父亲的儿子,她的心里就会舒坦些。由于长期以泪洗面,她的眼睛失明了。从此,她只能借助梦境来重温自己的爱情,记忆中深沉的爱情是存姐儿生命的支柱。《盼望》叙写战争年代一个母亲丰富、崇高的精神世界:阿依舍大婶把三个儿子送上了前线,她日日夜夜苦苦盼望儿子胜利归来;失去儿子后她把自己全部的情和爱化作对儿子无限的思念与追忆。盼望成了战争年代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精神支柱。《一条心》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示战争年代妇女与儿童经历的苦难:每年在父亲上前线去的纪念日,母亲都要带着小主人公去山梁上遥望父亲生前住过的地方,讲述父亲生前的事,让小主人公读那封已经读了一百遍的父亲的书信。作品中能看到俄罗斯战争文学的明显影响,如战争英雄胡金阿伯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教育小主人公,并告诉小主

人公, 他的父亲长得像俄苏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恰巴耶夫, 这让小主人公大受鼓舞。

雅斯尔·十娃子有许多诗歌也涉及战争中人的悲剧命运。如他在《妻人的歌》中写道:

你上仗呢, 我送哩,
眼泪像江。
临上车呢哩哩哩:
——你妻心慌。
我回来呢, 你等的,
妻胡思量。
……
光是为啥没回家,
我的亲人?
你咋把我哄下哩,
心呢没疼?
……
旦在世哩, 你回家,
叫我高兴。
旦没命哩, 托梦来,
叫我心定。^{[9]261-262}

这首诗与《心总不定》都是写妻子对阵亡丈夫的思念, 从妻子的视角对战争的悲剧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诗人在《得胜》中, 讴歌胜利与英雄的同时, 流露出深沉的悲痛与伤悼之情:

得胜曲子唱红哩,
钻心的音
……
可是我总没高兴,
也没喜欢。
黑云把心罩严哩,
眼泪像泉。
把兄弟咋扔下呢?
他的孤坟
……
咋回去呢我一个,
就像孤雁?
我给老娘说啥呢,
到哩天山?^{[9]275-276}

以上东干战争文学作品与俄罗斯战争作品的共同点是: 作品没有正面描写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与英雄事迹, 而是把叙事重心放在表现战争对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影响上, 以此来发掘生命的价值、否定战争。然而,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东干战争作品, 书写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得人们的怜悯与同情, 而是为了展示主人公抗争灾难的巨大精神力量, 从而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剧的壮美与崇高。如肖洛霍夫在《一个人

的命运》结尾写道: “我希望: 这个俄罗斯人, 这个具有不屈不挠意志的人, 能经受一切……”^[16]作家在主人公身上浓缩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涵。尔沙·白掌柜的《盼望》是这样结尾的: “阿依舍大婶还伫立在那里向这边张望, 就像她知道尔里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似的。也许, 这才叫做盼望, 一个母亲真正的盼望。”^[17]正是这种执著与坚韧的精神力量, 才使得东干民族能够承受各种苦难, 在逆境中与命运抗争, 这是东干民族精神的核心。

笔者认为, 东干作家与俄罗斯作家对战争中人的苦难的关注, 对生活的悲剧性的揭示是当时苏联的现实氛围与俄罗斯历时文化传统共同影响的结果。

1953年斯大林去世, 随后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苏共二十大, 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无冲突论”, 提出了文学创作要“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爱伦堡以《解冻》预告了文学界新时代的到来: 文学试图恢复俄罗斯文化和意识中被遗忘的人的感情, 开始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及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这个阶段的战争文学作品侧重表现人在战争中的命运, 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揭示残酷的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这股解冻思潮自然影响到了包括东干族作家在内的所有苏联作家及其创作。

从历时的层面来看, 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中有关关注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的东正教文化积淀, 东正教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苦难意识。正如当代俄国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所说: “一个民族的宗教理想形成于其对上帝的十分个人化的观点, 形成于其对基督的艺术的、圣像式的想象……同时也就有一位俄罗斯的基督, 这位基督在福音中常常与卑贱者为伍, 常和穷人、病人和受苦之人在一起。画家涅斯捷罗夫在自己的名画《基督与神圣俄罗斯》中很好地表现了这位基督, 画面上, 基督被乞丐、病人和小孩团团围着。”^[18]在俄罗斯文化的熏染下, 俄罗斯作家向来有关关注、书写人类苦难的优良传统: 从18世纪的拉吉舍夫开始, 到19世纪的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 再到20世纪的高尔基、肖洛霍夫, 等等, 都把穷人、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作为基本的书写内容, 体现了作家的苦难意识和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

受俄罗斯文化及俄罗斯作家的苦难意识的影

响,东干族作家关注人类的苦难,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并以艺术的形式为和平祈祷,如《盼望》《命运》等。在这方面,东干战争文学与中国战争文学完全不同:中国战争文学通常用宏大的战争场面或胜利结局的喜剧色彩,掩盖了战争中生命个体的苦难,缺乏对战争悲剧性的深层反思,这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

总之,在俄罗斯文化的历时传统与共时语境影

响下,东干与俄罗斯战争文学在主要特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同时,在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又凸显出一些独特的民族精神个性。在跨文化视野中多角度地对比研究,能使两个民族文学的特点得到彰显,既有助于探讨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及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深层发掘东干文学的独特魅力。

参 考 文 献

- [1] 常文昌,常立霓.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之定位及研究趋势[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52-58.
- [2] 陈学讯,编译.艾特玛托夫论少数民族文化[J].民族文学研究,1986(5):84-88.
- [3] 刘亚丁.全身心倾听革命——苏联文学与革命[G]//刘文飞,编.苏联文学反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 [4] Вьюнов Ю.А. Рус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архетип[M]. Москва:Флинта·наука,2005:128.
- [5] Пронина Е.П.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Часть 2[G]. 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2004:233.
- [6] 王国杰.中亚东干族与苏联卫国战争[J].东欧中亚研究,1997(4):93-97.
- [7] Макеева Ф.Х.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дунган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Фрунзе:Кыргызстан,1984:77.
- [8] Юсупов И.И. Основатель дунг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Ясыр Шиваза[M]. Фрунзе:Кыргызстан,1957:18.
- [9] 雅斯尔·十娃子.五更翅儿[M].比什凯克:伊里木出版社,2006.
- [10] 刘文飞.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俄罗斯文学[G]//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2-14.
- [11] 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2] 王岱舆.正教真途·真忠[M].余振贵,等译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225.
- [13] 杨峰.东干文化与东干作家文学漫议[J].西北民族研究,1997(2):226-237.
- [14]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88.
- [15] 阿·布罗夫.艺术的审美本质[M].高叔眉,冯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43.
- [16] Шолохов М.А.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M]//郑体武,编.俄罗斯文学选读:下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39.
- [17] 杨峰,编译.苏联东干族作家小说散文选——盼望[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21.
- [18]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4.

Mid-Asian Donggan and Russian War Literatur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I Jun-qin¹ CHANG Wen-cha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2.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Donggan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partly inherits some element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open to the impact of Russian cultur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multi-ethnic literatur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diachronic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ynchronic context Donggan war literature tends to be in obvious conformity with Russian war literature in its heroic theme, humanitarian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ragic artistic implication. Meanwhile, it has a special national identity due to the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and the unique Hui national psychology.

Keywords: Donggan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war literature; cross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李向辉)